

「忠閭」

——元明時代代州鹿蹄澗楊氏的宗族建構

韓朝建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提要

本文探討代州鹿蹄澗楊氏是怎樣一步步建立宗族的組織和禮儀的。楊氏在蒙古國時期起家，開始在地方佔據優勢。此後很長時間，楊氏保持着同居共財的大家庭的模式，有大量的祖墳地，有影堂。元代，隨着世侯地位的失去，楊氏開始建祠堂，裡面供奉祖先的塑像。元明之際的戰亂使得家族內部的關係受到影響，其中明初入籍的楊氏的後人取得家族的控制權。嘉靖時期，家族開始進行「標準」宗族模式的建設，比如修宗譜、立家約、置公田等等，儘管實際上在諸如宗子的設立以及祠堂塑像的安排方面做了很多不符合「標準」的妥協。同時，通過聯宗和追溯祖源，他們努力樹立楊氏正宗的地位。他們的種種努力獲得官府的表彰，官府甚至一度要替楊氏編修族譜。楊氏在元明時期的宗族建設過程中，一方面是人群的分化和重新整合，即利益的不斷再分配；另一方面則是不斷地尋求官府的承認和支持。其背後的關鍵，是楊氏一直都擁有大量的土地。

關鍵詞：元明時期、代州、鹿蹄澗、楊氏、宗族

韓朝建，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香港新界沙田，電郵：iamhans1981@hotmail.com。

本文曾在2008年6月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的一次報告會以及2008年12月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歷史視野中的中國地方社會比較研究」學術討論會上宣讀過，論文寫作和發表過程中得到趙世瑜、科大衛、鄭振滿等教授的批評指導，謹此致謝。

認為中國宗族南盛北衰的看法似乎已經成為史學界的共識，而且既有的研究成果也集中在南方。^① 即便如此，中國北方仍然存在宗族的事實卻是需要解釋的，換言之，這裡為什麼會有宗族？這裡的宗族，與中國其他地方比如珠江三角洲的宗族相比，有什麼自己的特色？本文即以元明時期山西代州鹿蹄澗楊氏的宗族建設為個案，探討楊氏是如何一步步建設宗族的，以及這個過程中體現了什麼樣的「地域文化」。本文集中探討元明時期，因為這是宗族的禮儀發生變化的重要時期。宗族禮儀進入中國各個地方的時間與方式不同，因此在地域對比上也具有意義。

本文所依據的主要材料是碑刻和族譜。鹿蹄澗村的楊氏祠堂，現在保存的碑刻有元代泰定元年（1324）〈弘農宗族圖碑〉、天曆二年（1329）〈題世將楊族祠堂碑記〉、嘉靖三十年（1551）〈贈雁門楊無敵宗嗣門匾敘〉和嘉靖三十五年（1556）〈表忠閭碑記〉，後面兩通碑分別是記載山西巡撫、山西提學副使和雁平道表彰楊氏一族的。

另外一些元明時期的文獻則收錄於《楊氏族譜》。族譜在明嘉靖、萬曆年間陸續修成，目前能見到的《楊氏族譜》分別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和光緒三十三年（1907）的重修版。道光族譜開頭的部份是〈舊譜紀略〉，即屬於明代的文獻，結合碑刻和其他材料，我們可以把這些文獻定位在一個大致的年代。本文在一定意義上，亦可以說是分析這些文獻的產生及其意義。

一、崛起於堅州、代州之間的世侯

楊氏活動的地點主要在代州（今代縣）和堅州（今繁峙縣）交界的馬峪、雁頭、東留屬和鹿蹄澗等村。他們早期主要生活在堅州一邊，後來最遲在蒙古國時期遷移到代州的鹿蹄澗村，這些村落的地理形勢是北靠雁門山脈，南臨滹沱河，村落附近的馬峪河等，都是滹沱河的支流。

北宋時期，由於這一帶是宋、遼對峙的前沿，朝廷在雁門山一綫的若干谷口駐軍，形成了軍寨。鹿蹄澗附近的胡峪以及馬峪河上游的馬峪寨，當時

① 關於宗族研究的學術史回顧，可參看常建華，〈二十世紀的中國宗族研究〉，《歷史研究》，1999年，第5期，頁140-162；井上徹，〈日本學界關於明清時代宗族問題的研究〉，載周天游主編，《地域社會與傳統中國》（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5），頁86-94。

都是軍寨。^② 這些軍寨在金代則升級為鎮。^③ 從蒙元時代開始，楊氏即以宋代的大將楊業為始祖，因為據說楊業曾駐兵於馬峪，「自宋朝初興，繁峙創立，曾任為官長焉」。^④ 從現存資料來看，楊氏最遲在金代就生活在那裡了。

實際上，鹿蹄澗楊氏的起家，開始於金蒙戰爭中崛起的世侯楊友和楊山兄弟。金末，蒙古軍與金軍在山西進行過多次戰鬥。在代州，明確記載的戰鬥有貞祐四年（1216）九月、興定元年（1217）二月和興定二年（1218）八月。^⑤ 其中，1217年，蒙古兵進攻雁門關，當時金朝的統治已經土崩瓦解，附近一些地方為求自保，便推舉了一些有威望的人士，向蒙古軍請降。當時，堅州的王兆、劉會等便是這樣的一批人。劉會被封為堅州都元帥，王兆被封為左監軍會軍事判官，戰爭中擄到的人口也被放回。^⑥ 楊友極可能也是此時歸順蒙古的，族譜記載：

（楊友）性好弓箭，事多權計，體仁行義，憐憫鰥寡，贍助貧窮，朋友交遊，多結四方之豪傑，抱義懷忠，有歲寒之梗概，眾皆仰視其風規，無不贊揚而悅服。後時戰鬥相持，干戈並起，凶歎相仍，黎民流亡，不可勝記。會遇大元天賜勃興，奄有區夏，公率方境之民順天歸命。^⑦

-
- ② 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86，〈志〉，〈地理〉，〈河東路〉，頁2133。
- ③ 脫脫等撰，《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26，〈志〉，〈地理〉，〈河東北路〉，頁632。對山西的鎮的介紹，參見田萌，〈金代山西的鎮〉，《忻州師範學院學報》，第24卷，第3期（2008年6月），頁73-75。
- ④ 〈龍虎衛上將軍鎮河東北路雁門留屬兼堅代永定軍節度使左領軍行元帥楊公諱友碑記〉（以下簡稱〈楊友碑記〉），約撰於元代，作者不詳，原收入道光《楊氏族譜》（道光二十七年〔1847〕），卷12，〈藝文〉，由於筆者所見的該版本族譜不全，此處轉引自新修《楊氏族譜》（1999），頁155-158。以下除非特別注明，所引皆為道光族譜。
- ⑤ 脫脫等撰，《金史》，卷14，〈本紀〉，〈宣宗上〉，頁320；卷15，〈本紀〉，〈宣宗中〉，頁328、339。
- ⑥ 〈劉元帥墓碑〉（至元〔具體年代不詳〕）、〈王氏世德之碑〉（皇慶元年〔1312〕），分別見李宏如拓並編，《繁峙碑文集》（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頁138-143、144-160。
- ⑦ 道光《楊氏族譜》，卷12，〈藝文〉，〈楊友碑記〉。

歸順蒙古，被看成是順天歸命，楊友亦由此獲得對「方境之民」的管轄權。與同時請降的王兆、劉會相比，楊友一開始並沒那麼顯赫，他很可能是後來立功才升為堅代永定軍節度使的。《金史》、《元史》都沒有他們的傳記，光緒《代州志》則評論說：「世祖以前，草昧初開，其豪長鳩集荒殘，能自成一旅即置為帥，如崞縣之崞山軍，五臺之清涼軍，皆有節度，仍金官制，與堅代之永定軍皆一時權宜，至建設路府而軍號併革矣」。^⑧事實上，金元時期，北方很多地方都是所謂的世侯在把持，大者如眞定史天澤、東平嚴實、益都李全等，都是蒙元史上扮演過重要角色的人物。山西地區同時也崛起很多中小世侯，他們父子相承，得以長期保持地方有力者的地位。^⑨

楊友歸順蒙古，其實是在動蕩的環境下的一種崛起策略，第二年（1218），金蒙軍隊在這一帶又有戰爭發生，蒙古軍隊於當年攻佔代州。楊友不僅隨蒙古軍南征西討，而且亦在本地的爭奪戰中獲取許多利益：

時南山賊未滅，侵奪河東太原，堅、代復破。公率百騎設伏以斷歸路，賊兵果至，公不避矢石，提兵入陣，奮擊賊軍，其賊大潰，步嶺而南走，公斬首級，奪到金鼓、旗、羊、馬、牛各千數，由此滹陽弗敢視，威振一時。^⑩

「南山」即五臺山，在堅州南境。所謂的「南山賊」，其實是原金將武仙的軍隊，這支軍隊是當時五臺山區直到河北的一支強大力量，在正大二年到四年間（1225-1227），武仙復叛，與河北世侯史天澤互相攻殺，武仙部下姬節、董佑往西入山西，攻打忻州、孟州等地，而山西較早投降蒙古的世侯則進行反擊。^⑪從楊友碑記來看，武仙的勢力盤踞在五臺山地區，進攻代州、堅州一帶，也應該是此時。楊友從進攻「南山賊」中獲得許多戰利品，奪到「羊、馬、牛各千數」，並且確立了在滹沱河北岸的優勢地位。

⑧ 光緒《代州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卷1，〈職官表〉，頁25。

⑨ 瞿大風，〈金元之際山西的漢人世侯〉，《蒙古學信息》，1999年，第2期，頁1-6。

⑩ 道光《楊氏族譜》，卷12，〈藝文〉，〈楊友碑記〉。

⑪ 參見〈故左副元帥權四州都元帥宣授征行千戶周侯神道碑〉（至元二十六年〔1289〕），載《定襄金石考》（《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第13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卷2，頁40下-49下。

他們在金末投降蒙古，然後又清理盤踞在南部五臺山區的殘金軍隊，創築城池，使得當地免卻了戰爭的進一步蹂躪。局勢穩定後，又招集流亡，開發地方，營造政府、庭館、臺榭，不僅如此，他們還贊助寺院和學校等。

楊友因為剿滅五臺山殘金軍隊，開發留屬地方，「蒙皇二大王韓開府恩命，遷龍虎衛上將軍，鎮河東北路雁門留屬，兼堅代永定軍節度使，左領軍行元帥」。但實際上並沒有證據顯示，楊友曾經有效地統轄堅、代二州全部地方。其實，由於地方同時也存在其他的世侯勢力，楊友統轄的核心區域只是滹沱河沿岸的留屬地方，「奈公以謙遜為心，乃保留屬之地」，^⑫也就是在「滹陽」，即滹沱河北岸地區確立其優勢地位。而對楊友一直提攜的「韓開府」，很可能就是北面金城（今應縣）的另外一個大世侯韓誥，韓誥起家同楊友一樣，也曾經向五臺山進攻，最終他在五臺山下的聶營佔有別業千頃，正與楊友的留屬隔河相望。^⑬因此可以說，楊友與其他世侯的崛起，其實是一個共同分享地方利益的過程。

楊友創下的事業延續到他的後代，楊友七子一女，兒子幾乎個個都有官職，比如次子思忠任振武軍節度使，三子思難任征行千戶。楊山的兒子思溫任代州管民長官，思恭任代州達魯花赤。第三代仍然繼續着這種地位，比如楊友的孫子楊璋任代州達魯花赤，而楊山的孫子楊全任代州提領。^⑭

因為這種地位，他們也往往與其他大族聯姻。比如楊友七子一女，楊山六子二女，「男女婚姻悉皆宦族」。楊友的從弟楊希有一女，嫁給「累佔科甲」的趙泰，趙泰是金朝代州唯一的進士，其外孫就是後來位至大都路都總管的姚天福。^⑮同時代的另外一個世侯王兆家族，也是「聯姻引戚，莫非卿士大夫」。他們已經告別了平民的身份，躋身士大夫的行列。^⑯這種局面的開創，是改朝換代之際的政治投機和政治聯盟帶來的結果。

⑫ 道光《楊氏族譜》，卷12，〈藝文〉，〈楊友碑記〉。

⑬ 〈報恩寺碑〉，見姚燧，《牧庵集》（《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版），卷12，頁513-514。

⑭ 〈楊族世系碑〉為〈題世將楊族碑記〉的碑陰，該碑存鹿蹄澗楊氏祠堂。

⑮ 〈大都路總都管姚公神道碑〉，見蘇天爵編，《元文類》（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卷68，頁985-990。

⑯ 關於金元之際的世侯與地方權勢的變化，參見蕭啓慶，〈元代幾個漢軍世家的仕宦與婚姻〉，《蒙元史新研》（臺北市：允晨文化，1994），頁265-348；趙文坦，〈金元之際漢人世侯的興起與政治動向〉，《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6期，頁53-60。

二、從同居共財到宗族創立

戰亂使得宋金時期的「衣冠舊族」受到重創，「近代因兵，緣邊郡邑首被其害，當時勢家貴族握據權位，其力足以扞患難，庇宗族，一旦猝遇擾攘，骨肉流離，至有無遺類口」。^⑰ 金元易代直接導致了地方權勢的更替。楊友一族既能世代做地方的保護者，其家族的發展必定較其他家族順利。「自兵興以來，亂離失所，辛苦愁嘆之氣，溢於閭里。惟彥誠（楊友）睦親保愛，骨肉完全，若不積功累仁，何得至此？」^⑱ 楊友的崛起，取代了以前的「勢家貴族」，其文化上也必有一定之建樹，以符合其新獲取之身份。

在楊氏後代的敘述裡，楊友、楊山的事蹟不但是楊族興起的故事，而且直接與後來定居鹿蹄澗村以及建設祠堂的事情聯繫了起來，下面是天曆二年（1329）的一個故事：^⑲

至元朝元帥公諱友、提控公諱山，於馬峪田獵，忽見白鹿，趣逐之，其鹿不見，石板留其蹄跡，因以為莊，名曰「鹿蹄澗」。廉莊既定，木本水源之報又興，創建祠堂，塑令開國公、武略、武功等神像五尊，春秋祭祀，乃仁孝誠敬之心，所以繼祖宗之志者，繩繩不絕也。

這通碑的作者題為元貢生趙鶴鳴，該碑也是關於鹿蹄澗起源的最早記述。現在的楊家祠堂內，尚保留着刻有鹿的形象的鹿蹄石。鹿蹄石之下是蓮花座，再下則是棱形柱礎，上刻「元泰定元年，宣聖十德」，由此來看，至

⑰ 〈王氏世德之碑〉，見李宏如拓並編，《繁峙碑文集》，頁144-159。

⑱ 道光《楊氏族譜》，卷12，〈藝文〉，〈楊友碑記〉。

⑲ 道光《楊氏族譜》，卷9，〈墳祠圖〉，〈世忠名將楊氏祠堂碑記〉，頁4。此碑題目與〈題世將楊族祠堂碑記〉內容類似，作者也題為同一人，但是內容有抵牾之處，比如前者把建祠堂、樹神像歸為楊友的事蹟，而後者則歸為楊懷玉的事蹟；再如前者認為設立公田是楊友所為，而後者則歸功於楊懷玉。李宏如估計該碑文為收入族譜時據原碑修改而成，見李宏如拓並編，《繁峙碑文集》，頁57。碑文用「元朝」而非「大元」或「國朝」，似乎為元代以後被修改並編入族譜的。

遲在泰定元年（1324），楊氏的後人就圍繞這個故事進行一系列的文化創建了，包括樹立鹿蹄石、創建祠堂等。

鹿蹄石故事的講述方式，容易使人誤解鹿蹄澗祠堂亦為楊友、楊山兄弟創建，實際上創立祠堂是楊山之曾孫楊懷玉所為，而且這通碑文亦是楊懷玉邀請趙鶴鳴所撰。所以這個故事的結構有兩層含義：鹿蹄澗祠堂是楊懷玉創建的；楊懷玉把立村的事蹟追溯到楊友、楊山兄弟。下文將會分析楊友、楊山時代和楊懷玉時代的家族發展是何特點，以及楊懷玉為何要這樣講故事。

實際上，楊友並沒有建設宗族，他的主要貢獻似乎全部與墳地有關。楊氏的墓地楊興鋪（東留屬），據說是宋代祖先楊興安葬的地方，俗呼七郎墳，其實如果我們留意楊友的事蹟，就會發現，這裡就是他所控制的最主要的地方之一，也就是說，楊友其實在用祖墳來合理化他對本地的控制。實際上，雁頭村才是楊氏真正的家族墳地：

公一日政暇，念母年高，意在先塋葬埋。堅州之西，乃公先祖延興之故塋也。詢協陰陽，改卜於此，真佳地也。於己丑年四月二十八日，公以祖考安厝於斯，並祖妣王氏。欲將太夫人程氏、叔父茂、孀母王氏等附焉。^②

儘管楊友的叔父、孀母也附葬在此處，但是他們的後人，即楊友的堂兄弟並沒有列名於泰定元年（1324）的〈弘農宗族圖碑〉的世系圖中。這個世系圖排列了從始祖楊業到立碑的楊懷玉共16代的世系傳承。正如碑文所言，立碑的目的是，「切慮其後子孫年遠不肖，宗派忘稱，名與上祖相同，尤為不孝焉」，這等於承認，在刻寫世系圖之前，楊氏族人其實對於遠祖的名諱也是不甚了了，所以楊懷玉才會這樣強調宗派圖的意義。但是如上所言，這個世系圖的主要目的，並非是要囊括所有以楊業為始祖的楊氏，它甚至沒有包括楊友、楊山的叔父楊茂的子孫。它詳細列的僅僅是楊友和楊山的子孫，此一安排的用意，是因為從楊友、楊山兄弟開始，才有同居共財的舉動。根據〈弘農宗族圖碑〉，楊氏實行同居共財的倡導者是楊友、楊山的母親程太夫人。該碑記載了程氏去世前，曾經對她的兩個兒子說過的一段話：

^② 道光《楊氏族譜》，卷12，〈藝文〉，〈楊友碑記〉。

我之在堂，汝勤孝道。我之化後，義讓同居。今視諸孫，未分優劣。爾等可立義書，以明我誠。如後不義，分別家門，另生異見，則可獨出，其事產資財，分文勿與。若經官呈告，驗此為證。於家之令，不在□□之理，豈不聞回貞之泣，荆樹再花。爾等無違，宜其慎矣！^①

其意思是不讓兒子們分家，以免共有的財產被分散，造成家庭凝聚力的削弱。如果有要分家的後代，則「分文勿與」。程太夫人的訓誡裡一個關鍵的詞是「義」字，在當時人看來，同居共財是義舉。程太夫人的這個故事，因為是元末講述的，所以當時在「諸孫」，即楊友、楊山的後代之間，應該存在一種兄弟不分家的協議，即所謂的「義書」。〈弘農宗族圖碑〉的碑陰列舉了這幾十個子孫的名字（見圖1）。

楊友七個兒子、楊山六個兒子，除卻無子與早卒的三門，總共是十個房支的後人。這群人即是程太夫人所言的「諸孫」。立碑者是楊山曾孫，即元末的楊懷玉及其四個弟弟廷玉、懷美、懷從、懷卿。^②書丹的則是曾為楊友撰寫墓誌的趙鶴鳴。因此可以說這個世系圖雖然認同楊友、楊山總共十門的後人，但實際上一直是懷玉一支在操縱整個刻碑、建立世系以及建立宗祠的活動。通常，族譜的修纂或者世系的確立，必定以作者及其近親為中心。^③這個世系圖也顯示，楊懷玉兄弟四個是整個世系的中心，他們的族兄弟輩的名字都沒有列在上面。因此，我們要了解程太夫人的家訓以及楊氏早期歷史的構建，必須弄清楚立碑者楊懷玉的作為和他所處的環境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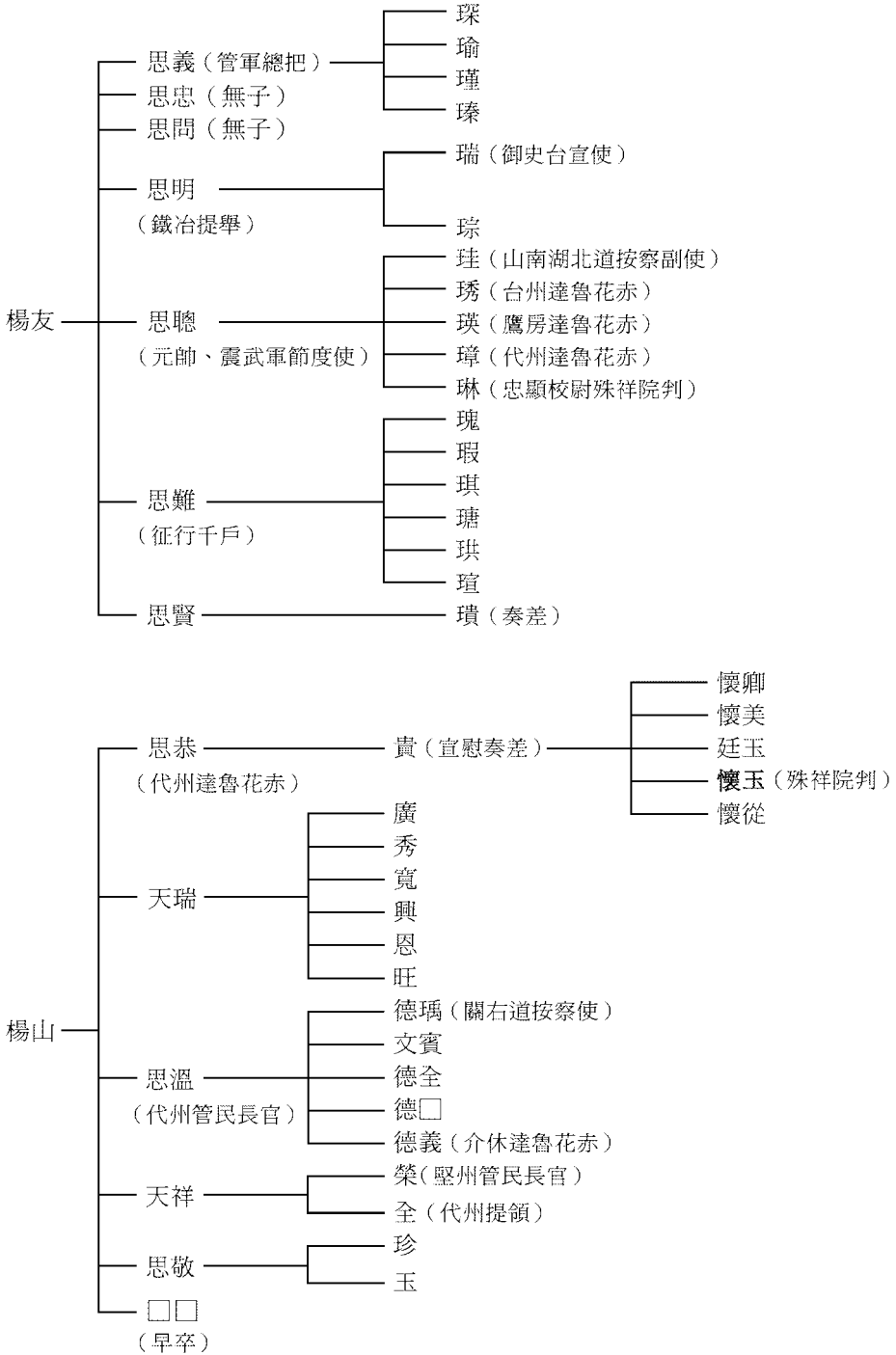
其實，碑文也講到，他們之所以可以同居，是因為共財。根據碑文，程太夫人所說的家族的財產主要指墳地和圍場。根據天曆二年（1329）趙鶴鳴所撰的〈題世將楊族祠堂碑記〉，土地在元末修族譜的楊懷玉時代達到最大規模：

① 〈弘農宗族圖碑〉（泰定元年〔1324〕），碑存鹿蹄澗楊氏祠堂；亦參考李宏如拓並編，《繁峙碑文集》，頁48-53所收錄之碑文。

② 〈弘農宗族圖碑〉及其碑陰，碑存鹿蹄澗楊氏祠堂，碑文及世系圖主要依據李宏如拓並編，《繁峙碑文集》，頁48-53。

③ David Faure, "The Written and the Unwritten: The Political Agenda of the Written Genealogy", 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上冊，頁259-296。

圖1：楊友及楊山子孫世系



資料來源：〈弘農宗族圖碑〉碑陰，碑存鹿蹄澗楊氏祠堂。

（楊懷玉）於馬峪偃頭村護墳地一項二十畝……更外推本修霍山始祖墳一十頃，孤山太君夫人塋地二十二頃，堅州楊興塋地一項二十畝，五里村塋地一項二十畝，杲村塋地六十畝，代堡塋地六十畝，仍置遠祖園三處，遠楊園、郭家莊、高崖溝園，柵子山地三十余頃，以供春秋祭品。^{②④}

墳地、護墳地共計約36.8頃。我們先考察一下這些土地的分佈，孤山、代堡，在堅州東部；偃頭村、楊興堡、楊家園，在堅州城以西。這兩組田地皆位於堅州，但相隔很遠。五里村在代州境內；高崖溝在崞縣大陽鄉南頭村；杲村亦在崞縣；霍山則遠在南方的霍州。其餘遠楊園、郭家莊位置不詳。這麼多的墳地分別分佈在代州、堅州、崞縣、霍州等地方，相隔數百里，似非楊懷玉個人所能置辦，或許是他的先輩利用職務之便所佔，或許是聯合了其他的楊氏所佔，目前我們缺乏直接的材料來說明這些土地的獲得途徑。

但是這些土地的用途卻是清楚的，他們反復強調土地是為了「供春秋祭品」，即是作為蒸嘗田來建設宗族的。在這樣的背景下，楊懷玉特意強調了高祖母程太夫人的家訓，描繪了程太夫人去世時的盛大場面，強調家族同居共財或別居共財的一面，以此作為歷史依據。

楊懷玉為何在這時才大規模地建設宗族？材料沒有明說，不過我們可以做出初步推測。楊懷玉建設宗族之前，楊氏已經是同居共財的大家庭了，這其實是一個漢代肇端、興盛於宋代的「義門」的傳統。楊氏內部組織的強化，似乎與當時的地方管理體制的變化有很大關係。蒙古國在其統治穩定下來之後，曾經於1235、1252和1270年在北方進行大規模戶籍統計。^{②⑤}這些政策在代州也實施過，比如楊氏祖居地馬峪里的魏氏，即是屬於「上戶」的等級。^{②⑥}

朝廷的戶籍統計配合了流官對地方的直接管理。因為在定戶籍的同時，朝廷也在進行官制改革，這對世侯的地位有所影響。一開始蒙古授予漢地世

②④ 〈題世將楊族祠堂碑記〉，碑存鹿蹄澗楊氏祠堂。

②⑤ 關於元代「義門」的情況，參見劉曉，〈試論累世同居共財在元代的發展及其特點〉，《中國經濟史研究》，2001年，第1期，頁141-148。

②⑥ 〈魏氏墓碑〉（延祐七年〔1320〕），見李宏如拓並編，《繁峙碑文集》，頁161-166，該墓碑的落款是「馬峪里上戶祭主雁門站提領魏廣等眾房族」。

侯的官職，多是仿照金朝的官制，如元帥、都元帥、節度使等等。後來才漸漸實行蒙古官制，比如萬戶、千戶、達魯花赤等等。^⑳ 這種變化從楊友、楊山及其子孫的官職名稱上很明顯地反映出來。當蒙古在北方的統治穩固下來時，他們會慢慢地收回權力。1251年，即蒙哥登上汗位的當年，「朝議釐定官制，州郡武職多見易置」，堅州的小世侯也受到影響。^㉑ 到了忽必烈時代，以蒙古人、回回、漢人、南人區別對待為標誌的四等民的政策，直接影響到了元朝地方上的行政人事安排。至元二年（1265）二月，朝廷下詔：「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花赤，漢人充總管，回回人充同知，永為定制」。^㉒ 此後仍不斷地申明該項政策，至元五年（1268）三月，「罷諸路女直、契丹、漢人為達魯花赤者」。至元十六年（1279），「議罷漢人之為達魯花赤者」。據此推測，至元年間漢人就已經不能充任地方的最高監臨官了。^㉓ 楊懷玉的祖父楊思恭任代州達魯花赤，族祖楊思溫任代州管民長官，楊思聰任元帥、震武軍節度使，都是代州地方的長官。其族叔楊榮任堅州管民長官，楊全任代州提領，楊璋任代州達魯花赤。根據官制的變化，這種本地任職的情況似乎最遲延續到至元年間。

楊懷玉的父親楊貴是宣慰奏差，即宣慰司負責上傳下達的吏員。楊懷玉跟他父親一樣以筆墨見長，他擔任的是殊祥院的奏差（有時亦稱殊祥院判）。殊祥院是負責朝廷禮儀的衙門，殊祥院的奏差是負責傳達政令的吏員。天曆元年（1328），殊祥院被廢除，併入掌握神御殿祭祀典禮的太禧宗禋院。^㉔ 楊懷玉父子兩代均為低級吏員，而且都沒有出職任官，^㉕ 可見已非昔日光景。又根據清代的碑記，楊懷玉的一個兄弟廷玉曾任兵部左侍郎，後調任鳳陽，也已不在本地任職了。^㉖ 此外再無族人任官的記錄。因此，楊氏

⑳ 張金銑，《元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1），頁105。

㉑ 〈王氏世德之碑〉，見李宏如拓並編，《繁峙碑文集》，頁144-159。

㉒ 宋濂等撰，《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6，〈本紀〉，〈世祖三〉，頁106。

㉓ 參見蒙思明，《元代社會階級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48-49。

㉔ 參考邱樹森主編，《元史辭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2），頁900。關於蒙元官制，感謝王東平教授答疑解惑。

㉕ 關於元代的吏制，參見趙世瑜，《吏與中國傳統社會》（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頁102-127；許凡，《元代吏制研究》（北京：勞動人事出版社，1987），頁14、30。

㉖ 〈宋元楊氏封秩碑〉（同治十年〔1871〕），現存鹿蹄澗楊氏祠堂。

此時建設宗族，可能有維護社會地位的用意。我們進一步看看楊懷玉在當年的宗族建設：

（楊）貴生殊祥院判懷玉。尊祖敬宗，建祠堂於鹿蹄澗村。上溯遠祖之所自，以及祖父，皆塑像。各立冢碑於馬峪雁頭村，護墳地一頃二十畝，凡翁仲、石獸充列俱備。³⁴

楊懷玉「上溯遠祖之所自」，由此可知這是一個大宗祠。但是祠堂裡供奉的不是神主牌位，而是塑像。楊氏建設宗族的另外一個外在環境，是趙復北上之後，理學開始在北方傳播，後通過重開科舉，影響進一步擴大。³⁵從這個意義上說，楊氏的宗族建設或許反映了理學正統的逐漸樹立。

楊懷玉當時非常清楚楊氏在全國的分佈情況，〈題世將楊族祠堂碑記〉首先講述楊氏的世系，次講楊懷玉的宗族建設，末尾又講楊氏的分佈：「故始無敵知代州，暨而散鎮川廣，流佈英種於川廣淮揚間，終則友、山復節度於代、堅，世系延綿之如此」。通過對先輩們通譜的記述，楊懷玉把代州楊氏跟播州楊氏、淮揚楊氏聯繫了起來。他希望能把這個世系確定下來。「將三代之圖，刻碣之陰，以貽後嗣，享祭之余，可為鑑矣」。³⁶刻世系於石碑，是金元時期山西常見的做法，而明清以來基本上被族譜和祖先圖取代了。所以這個時候的宗族禮儀，具有從宋金到明代的過渡階段的特徵。

鹿蹄石其實起到一種「族徽」的作用，它所聯繫的歷史，一端是作為世侯的歷史，另一端則是興建祠堂的歷史。蒙哥汗到忽必烈時期，戶籍制度的推行以及朝廷對官制的釐定，使得世侯地位開始衰落。在這個過程中，家族內部的組織方式發生了變化，他們的後人由同居共財開始，逐漸創立宗族，

³⁴ 〈題世將楊族祠堂碑記〉（天曆己巳〔1329〕），貢生趙鶴鳴作，現存鹿蹄澗楊氏祠堂。趙在元末相當的活躍，成化《山西通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濟南：齊魯書社，1996），卷7，〈祥異〉，頁37下-38上，以及卷17，〈碑目〉，頁8下，記載他曾在後至元六年（1340）作〈石州嘉禾記〉。楊懷玉曾邀請他為楊家寫了不少碑記，包括上述的〈弘農宗族圖碑〉。

³⁵ 姚大力，〈金末元初理學在北方的傳播〉，載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第二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217-224；安部健夫，〈元代的知識分子和科舉〉，載劉俊文主編，索介然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五卷·五代宋元）（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636-679。

³⁶ 〈題世將楊族祠堂碑記〉，碑存鹿蹄澗楊氏祠堂。

積極建設祠堂的楊懷玉是個禮儀方面的專家，祖先的追溯、世系的擬定、祠堂的創建，都由他主導完成。楊懷玉的後人由此實現了對祠堂以及宗族土地的控制。

三、明代鹿蹄澗楊氏的八門及其宗族設計

元末的戰亂使得代州遭到很大破壞，「值至正戊戌，河東經兵燹，代當南北之衝要，車騎蹂躪甚他郡。民居公廡、諸聖廟宇鞠為丘墟」。^⑳ 戊戌為至正十八年（1358），當年，原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叛山東，「曹、濮賊方分道逾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雲中、雁門、代郡，烽火數千里，復大掠南且還」。^㉑ 同時代州又遭遇旱災。天災人禍造成的破壞一直沒有完全恢復，至正二十八年（1368），在局勢稍微緩和之際，代州開始動工修建文廟，工程完成已經是改朝換代的洪武二年（1369），此時代州被明軍佔據已經半年多了，但是重修碑記的開頭卻是「聖元之崇文廟也」，而且碑文中根本沒提及新朝，可見明朝的統治開始並未得到建廟士人的認同。^㉒ 實際上，洪武三年（1370），明廷還命令唐勝宗「捕代縣反者」，也曾命令陸仲亨「責捕盜於代縣」。^㉓ 這些所謂的盜賊，現在已經很難指實到底是哪些人了。

鹿蹄澗楊氏亦遭受重創，「元季竄分四野」，^㉔ 族人流散。楊懷玉的兒子是楊紳，楊紳有五個兒子：懷甫、慶甫、成甫、通甫、震甫。其中懷甫遷居到保定府定興縣留村，成甫遷居真定府定州行唐縣，通甫遷居順天府大興縣，慶甫無後，留在鹿蹄澗的全部是楊震甫的後人，他曾任元朝「浙江溫州

⑳ 席公舉，〈重修廟學記〉，見光緒《代州志》，卷6，〈金石志〉，頁21下-23上。

㉑ 宋濂等撰，《元史》，卷141，〈列傳〉，〈察罕帖木兒傳〉，頁33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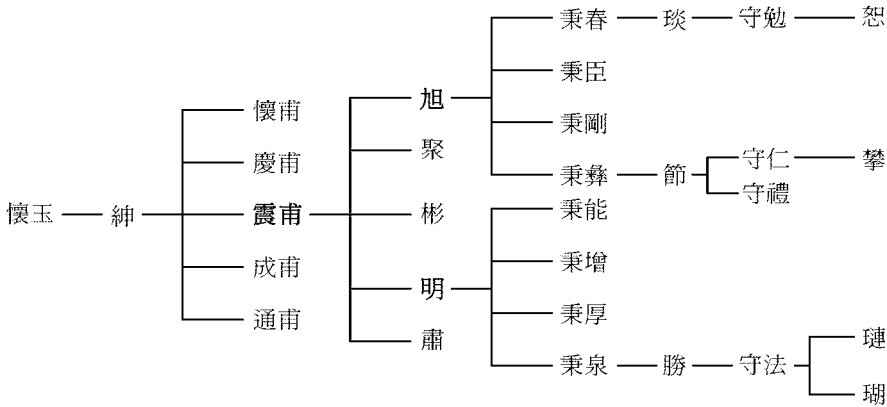
㉒ 席公舉，〈重修廟學記〉，見光緒《代州志》，卷6，〈金石志〉，頁21下-23上。

㉓ 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131，〈列傳〉，〈唐勝宗傳〉、〈陸仲亨傳〉；卷308，〈列傳〉，〈胡惟庸傳〉，頁3850、3851、7907。

㉔ 據〈明處士翁楊孺人楊母高氏合葬墓誌銘〉，墓主為楊恕，於嘉靖四十一年（1562）去世。銘石現存鹿蹄澗村「根祖文化園」。

水師統領挂印總兵」。^④震甫生子五人，其中肅、彬、聚遷移到外地，留在代州的是明與旭，明代的楊氏就是楊旭與楊明的後人：

圖2：鹿蹄澗楊氏八門世系略圖



資料來源：道光《楊氏族譜》，卷1，〈舊譜紀略〉，〈世家本紀舊文〉；〈明處士楊翁孺人楊母高氏合葬墓誌銘〉，現存鹿蹄澗「根祖文化園」。

明初設立里甲，鹿蹄澗楊氏成了大明王朝的編戶齊民。「遺風至旭，遂屬民於山西太原府代州望臺里。」^④無疑，楊明、楊旭分別是明初的入籍祖。族譜里沒有出現「入籍」這樣的字眼，可能是為了表明他們原來即是本地的居民，比後來入籍的人群的歷史更加悠久。

由圖2亦可見，二人各有四個兒子，合起來共八門。八門就是後來鹿蹄澗村楊氏的基本構成。八門的權利和義務的關係，很可能是明初的政治和經濟環境變動下而形成的。八門之外的其他宗支基本上是聯宗通譜產生的結果，對鹿蹄澗土地、祠堂和祭祀沒有支配權力。鹿蹄澗的大量族田即護墳地，由八門輪流耕種，作為年節祭祀費用。族譜記載了八門的權利和義務：^④

祭祀財物出自護墳之地。楊興鋪七郎墳地一項二十畝，雁頭村元帥墳地一項二十畝，鎬村墳地六十畝，馬峪墳地一項二十畝，遠

④ 楊紳、楊震甫的官職俱見〈宋元楊氏封秩碑〉（同治十年〔1871〕），碑存鹿蹄澗楊氏祠堂。

④ 〈明處士楊翁孺人楊母高氏合葬墓誌銘〉，銘石現存鹿蹄澗村「根祖文化園」。

④ 道光《楊氏族譜》，卷1，〈舊譜紀略〉，〈族譜舊例〉，頁18下。

楊等圍共護墳地三十頃，安家嘴供祭地五十畝，八門輪種，收粟以辦祭祀，勿得攙越錯亂，違者宗子責治。

這幾塊護墳地，總數高達3470畝，而且都是蒙元時期已經存在的，其中楊興鋪、雁頭村、馬峪、安家嘴分佈在繁峙界內，鎬村在崞縣。從它們變成祖墳地的時間來看，楊興鋪、雁頭村、馬峪等地是蒙古國時期即存在的老墳地，而安家嘴和鎬村很可能是明代才增加的，更重要的是，這些土地沒有一塊是在鹿蹄澗所在的代州，換言之，都是以「寄莊」形式存在的。

公田的存在，使得他們能夠按照禮制進行宗族的建設。嘉靖三十五年（1556），山西提學副使陳樞在褒揚鹿蹄澗楊氏時說：

及入我明，尤沾世澤，支脉繁衍，文武侯伯，雲仍相繼。且能重祠祀、明宗譜、立家約、遵聖教、置公田、立射圃。^④

可見，在陳樞對楊氏表彰之前，他們已經有一系列構建宗族的努力了。其中，所謂修宗譜、立家約、置公田、立射圃等活動，不見於元代的文獻，因此應該是明代的創制。根據族譜記載，大規模的宗族建設共有三次：第一次由永樂時期的楊明和楊旭進行，他們成了後來「八門」的祖先；第二次是宣德年間曾做過綏德州的知州楊節；第三次是嘉靖、萬曆年間的楊攀、楊瑚，他們是後來和播州聯宗，使楊氏受到表彰以及編寫家譜的主要人物。最遲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他們已經是相當規整的宗族了。從上面的世系圖可看出，後兩次宗族建設的主角楊節及其孫楊攀、族孫楊瑚、楊璉，分別屬於八門之中的秉彝和秉泉兩門。

但是，楊氏八門最近的共同祖先只是明初的楊震甫，從楊震甫直到楊瑚、楊璉、楊攀諸輩，楊氏也只有六代人而已，剛剛過了「四世則遷」的階段。無論怎樣說，八門都只是元代傳下來的一個小分支的後人。但是這個小宗支在明中後期，卻努力地去建設一個標準化的宗族，甚至行大宗之法。

楊氏有宗子，我們僅僅從〈族譜舊例〉中知道宗子「未立之先，須擇德行服眾者立之，既立之後，必有大故不能應事，方可選替」，看來，宗子的選擇並不是按照「嫡長子」的原則來進行，而是通過推舉的方式來確定的。

^④ 〈表忠閭碑記〉（嘉靖三十五年〔1556〕），碑存鹿蹄澗楊氏祠堂。

根據族譜規定，宗子主合族之事，如果八門輪種公田錯亂的話，宗子有權責治；族人如果遇喪不吊，或者「喪家鄙吝」、「戶人怠忽」，宗子即以不孝加以懲罰；對族人的婚姻，宗子亦有權干涉。^{④⑥}

楊氏的祭祖活動同樣很有組織，楊氏每年又選祀長三人，分別主出納分胙、辦理祭料、潔淨祭器和迎請隨祭之人。在正旦、清明、冬至等節，祭祠堂眾祖神主（而非塑像），在清明、七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拜掃墳塋。^{④⑦}族譜中收錄有一篇〈公田記〉，可能即是嘉靖年間的楊攀、楊瑚的一個朋友所作。根據這篇記文，楊氏每年的祭祖費用便是取諸這幾十頃的公田：「每祭三百餘人，需金之數，不行會斂，皆取諸護墳之公田」。^{④⑧}

祠祭的對象則是從楊令公開始的很多個世代的祖先，在祠祭的時候楊氏表現得非常合乎禮制。〈公田記〉的作者親眼目睹楊氏祠堂祭祖的盛況，對此大加讚賞，稱之為「無不有禮」，「非徒事虛文」，「斯舉也，盡仁孝之思，辨尊卑之分，洽神人之歡，誠不刊之巨典」。因此，至少明中期的時候，楊氏試圖在祠祭上做一個標準的「禮」的家族。作者希望「記之以為觀禮者採」，即是把楊氏作為當時實踐禮制的榜樣，希望能引起官府的注意和推廣。

楊氏的標準的禮的表現，還包括反對佛、道、巫術等，族譜規定「不可從道士燒煉，不可信浮屠看經，不可容師巫出入」，所以在宗族禮儀上，楊氏實際上表現出嚴格遵循儒家倫理的特點。可是，當我們反觀蒙元時期，可以發現楊友其實是非常熱衷於佛教和道教的活動的，「重修寺觀，嘗請延緇侶，結春夏講。設席建壇，屢修黃錄之筵；敷演梵音，嘗起萬僧之會」。^{④⑨}其母親去世的時候，楊友極力鋪張，請了「緇侶千餘」來做法事。^{⑤⑩}可是，

④⑥ 道光《楊氏族譜》，卷1，〈舊譜紀略〉，〈族譜舊例〉，頁17下、18下、19。

④⑦ 道光《楊氏族譜》，卷1，〈舊譜紀略〉，〈族譜舊例〉，頁18上。

④⑧ 道光《楊氏族譜》，卷1，〈舊譜紀略〉，〈公田記〉，頁23下-24上。大約在萬曆三十五年（1607），河南清吏司郎中任彥棻寫道：「至於世次封秩之詳，則存其世家本紀，錄其誥敕券文以備參考焉。至其〈原宗錄序〉、〈題詞〉、〈人物表〉、〈宗說〉、〈公田〉、〈習射〉等篇，不知何代所作，皆未着其姓名，內間有差訛及文勢難通者，蓋傳寫之謬耳，今亦無所考證，不敢妄為刪改，俱存舊文以俟後君子裁焉」，見道光《楊氏族譜》，卷1，〈舊譜紀略〉，〈楊氏傳略〉，頁16。因此這篇〈公田記〉應該是萬曆三十五年（1607）之前即已經存在之文獻，因此很可能是嘉靖年間的楊攀、楊瑚等人所作。

④⑨ 道光《楊氏族譜》，卷12，〈藝文〉，〈楊友碑記〉。

⑤⑩ 〈弘農宗族圖碑〉，碑存鹿蹄澗楊氏祠堂。

在明中葉的時候，他們卻要把反佛道的規定作為家約寫入族譜，這亦成為官府對其加以褒獎的依據之一。

與此相應，楊氏亦重視科舉入仕。第22代楊節，少年時代受宋代大儒楊時的影響，「殫心詩書，銳志道德」，據說宣德十年（1435）曾做過綏德州的知州。^⑤ 他們在明代頗重視科舉教育，如處士楊恕，「翁冀彼先伯祖皆以科名終身，遂嚴教子孫，是以長子廷瓊以承差授西樂驛丞秩；次廷珠，現候吏部，冠帶省祭。長子配李氏，生孫曰檀、曰楠，充布政司一承一吏；次子亦配李氏，生孫曰楫、曰棣，皆業儒，為代州庠生，年方弱冠」。這種狀況部份歸功於其良好的經濟狀況，「遵守農桑，遂致家隆興，族之官居者同富庶」。^⑥ 族人獲取功名也是家族建設的必要條件，可是除了楊節曾擔任知州外，其後人楊攀等人並沒有科舉功名。前述處士楊恕的子孫也只是庠生而已，他們並沒有特別高的功名。楊氏宗族建設的成功，除了憑藉大量公產之外，還有他們塑造正宗的策略。

四、大宗祠與楊氏正宗的塑造

明代鹿蹄澗楊氏的宗族建設，雖然在禮儀上盡量做到正統化，但是在很多方面其實已經有了一些變通，比如選擇宗子採用的是推選，而非嫡長子繼承的原則。早在元代楊懷玉建設宗族的時候，楊氏祠堂所立的就是令公以下的諸位祖先的塑像。到了明代，祠堂似乎仍延續了塑像為主的樣式：「立廟從祀，以中書令祖為中立不遷之像，下則取有功國家者，餘皆從祀兩廊，有爵書爵，無爵排其名，以序昭穆」。^⑦ 所以楊氏的家廟塑像不是嚴格按照長幼資格，而是有官爵取向的，同時從塑像的延續也可以看出，他們其實還在採用一個更早的文化傳統。

因為元、明時期楊氏所謂的「宗」，是一個從宋代的楊業開始的世系，祠堂祭祀也以楊業為始祖，所以楊氏宗祠是個大宗祠。實際上，明代鹿蹄澗的宗族建設者明顯意識到這一點，所以他們在不斷地「原宗」，即通過對先

⑤ 據順治《綏德州志》，卷6，〈宦蹟〉，明代的綏德知州卻有楊節其人，但是對於籍貫和任職年代，都沒有任何文字說明，州志把其歸入景泰年間，與族譜所謂宣德十年（1435）有很大差距，而乾隆《綏德州志》甚至沒有楊節的名字。

⑥ 〈明處士楊翁孺人楊母高氏合葬墓誌銘〉，銘存鹿蹄澗「根祖文化園」。

⑦ 道光《楊氏族譜》，卷1，〈舊譜紀略〉，〈族譜舊例〉，頁18上。

代世系的重新梳理和確認，力圖樹立楊氏正宗的地位。根據〈楊氏族譜題詞〉，當時「滿天下率皆伯僑之後」，作者「楊君」曾極力考證，證明自己才是周成王之孫伯僑的後人，「原宗脈之傳，而別其諸楊」。⁵⁴ 嘉靖三十五年（1556）之前，在族譜之外，「楊君」已經編寫了《原宗錄》這樣的作品，族譜所收是該書序言：⁵⁵

郡傳鹿蹄澗巨族楊氏，乃宋將中書令楊業之後也，人言雖若，將信將疑，及詣見故家遺物、祠堂、碑訓，因而詢及家譜，簡帙重大，楊君出所自敘《世家》、《原宗錄》以示，愚啓而觀之，開口傳家，其來尚矣。公卿名將，無世無之……（楊君）原其始祖，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以明其宗脈，以序其昭穆，以序其爵，以序其賢，以錄其功，合大小之宗，聯支庶之眾，摘簡絀繁，典而明也；制理陳事，嚴而辨也。

可見，確實有些人很懷疑鹿蹄澗楊氏是否是楊業的後人，楊氏為了取信於人，除了展示「故家遺物」以及祠堂等這些實物之外，他們還保存有大部頭的家譜，並且自己撰寫了作品以申明之。族譜中收錄的除了這篇〈原宗錄序〉之外，還有〈原宗錄引〉、〈敘原宗說〉、〈宗說〉等三篇文獻。除此之外，楊氏正宗地位的塑造，還與楊氏的聯宗策略有關。根據〈敘原宗說〉，其聯絡的範圍是：崞縣鎬村、大陽鄉，繁峙代堡，大同，以及束鹿、翼城、曲沃、蒲州、澤州、播州、六合、漢中、開平、安化、雅州等地的楊氏，「俱以冊頁墓誌碑記統入宗譜，俾諸楊在外者知我宗脈以會其極，以歸其宗」。在當時禮制之下，即使是品官之家，其祭祖亦不能超過四代；楊氏對於立大宗是有忌諱的，但是他們覺得「從小宗之法則散，從大宗之法則僭，不從宗法則亂。與其亂而散也，莫若從僭，以聯吾宗，譜族之萃於一矣」。⁵⁶

可是，這裡需要解釋的是，為什麼鹿蹄澗楊氏寧願僭越禮制，還要行大

⁵⁴ 道光《楊氏族譜》，卷1，〈舊譜紀略〉，〈楊氏族譜題詞〉，頁17上。

⁵⁵ 道光《楊氏族譜》，卷1，〈舊譜紀略〉，〈原宗錄序〉，頁20上-21上。根據注⁴⁸所引資料，《原宗錄》必在萬曆三十五年（1607）以前寫成，揆諸此前楊攀修祠堂、編族譜之事蹟，「楊君」很可能指的是耆老楊瑚。

⁵⁶ 道光《楊氏族譜》，卷1，〈舊譜紀略〉，〈宗說〉，頁23。

宗之法？是否僅僅是為了「會極歸宗」？為了解此點，我們以族譜中記載較多的與開平楊氏聯宗的事例來加以說明。

開平楊氏據說是來自播州楊氏，其先是楊令公之曾孫楊貴遷。楊貴遷的父親廣州刺史楊充廣，因「持節廣西，憫播州之孫昭無子，遂以貴遷嗣之，自是，守播者皆業之後也」。明初，其後人楊政從軍，任漢中衛百戶，楊政之孫楊洪遷開平，因功封昌平侯。楊洪與其子楊俊、楊傑、其侄楊信多年鎮守長城沿綫，尤其是宣府、大同二軍鎮，聲威煊赫：

（景泰二年五月）上慮虜情反復，宜有大將在邊，乃命公（楊洪）掛鎮朔大將軍印，領禁衛兵千六百往鎮宣府。虜聞公至，皆自引去。……蒙賜敕獎諭甚切，至自公再至，宣府軍聲為之大震。關北之人固皆以為虜不足為其患，關南之人亦莫不為奠枕而安曰：「有楊公鎮宣府矣」。……至於壅塞道路，求識其面不得，輒怏怏終日者，其聲價之得於人也如此。⁵⁷

傳記所載可能有點誇大其辭，但楊洪在雁門關南北確實有很大影響，《明史》稱：「洪父子兄弟皆佩將印，一門三侯伯。其時稱名將者，推楊氏」。聲威如此顯赫，以至楊洪後來以「盛滿難居，乞休致」。⁵⁸ 鹿蹄澗祠堂所存的元代的碑刻上已經有與播州楊氏通譜的記載，⁵⁹ 明代的聯宗通譜大約就是在楊洪任鎮朔大將軍的時候，鹿蹄澗的楊氏跟楊洪為代表的播州楊氏有過一些交流，〈開平楊氏續錄序〉明確記載的交流有下面幾次：⁶⁰

⁵⁷ 陳循，〈昌平伯進侯追封潁國公諡武襄楊公洪神道碑銘〉，載焦竑輯，《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10，頁11上-18上。

⁵⁸ 張廷玉等撰，《明史》，卷173，〈列傳〉，〈楊洪〉，頁4610。

⁵⁹ 播州楊氏是楊令公的後代，這種說法應該自南宋就開始了，譚其驥先生的〈播州楊氏傳〉已有論述，見《長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上冊，頁261-296。至於族譜載從播州遷徙到揚州六合，卻有一點疑問：明初宋濂為播州楊氏作的〈楊氏家傳〉裡僅說第五世楊選生13個兒子，只有軫、軾最賢明。那麼楊軾當跟他們屬於同一輩分（第六代），時間當在南宋初年，這樣抗金名將楊存中才有可能跟他通譜。但按鹿蹄澗族譜所收碑記，則楊軾是第八世，做六合令在慶元（1195-1200）間，與楊存中的生活年代相距較遠，姑存疑。

⁶⁰ 道光《楊氏族譜》，卷1，〈舊譜紀略〉，〈開平楊氏續錄序〉，頁24下-25下。

參與者	年代	地點	備注
楊景（楊洪父）與楊明、楊旭	永樂	代州	從漢中調開平，路經代州
楊洪與楊節	約宣德至景泰間	北京	歡如平生，咸以宗人親之
宣府參將	嘉靖、萬曆	代州	瞻拜祠堂
楊攀	嘉靖、萬曆	播州	會譜

嘉靖時，楊瑚新續族譜，特意給開平楊氏留了一個位置。他在〈開平楊氏續錄序〉裡，認為鹿蹄澗楊氏與開平楊氏二家的分流，其實從宋代就已開始了，現在只是重新合流而已。並申明聯宗不是結黨，不是「繫於宗黨比昵之私」，是求同存異而已。他所說的「求同」，即雙方認同的基礎，乃在於都是將領之家：「吾家以介胄名，敢以當代分流介胄之士而有不同乎」。^①可以說，楊氏的大宗祠除了營造楊氏正宗的作用之外，便是服務於聯宗的需要。早在嘉靖三十年（1551），驛丞楊攀和耆老楊瑚還曾不遠萬里去播州聯宗。

楊氏從永樂開始，即刻意與顯赫的家族尤其是邊關守將聯宗，以祠堂作為聯繫的方式，甚至在祠堂供奉一些楊氏著名人物的神主。開平楊氏其實是個軍人的家族，軍人需要的是一個忠義的認同，前述與鹿蹄澗楊氏聯宗的楊洪，就曾經建有「忠義堂」。^②

同樣，鹿蹄澗的祠堂裡懸掛有地方將領贈送的匾額，比如附近的北樓口守將蔡元熙贈送的「三晉良將」的匾額。^③可見他們對於軍人的重視，其實很大程度上在刻意塑造一個忠義之後延綿不絕的印象。而為了了解這個印象的更直接的意義，還需明白在這個製造形象的過程中官府所扮演的角色。

五、官府對「忠閭」的表彰

鹿蹄澗楊氏在嘉靖、萬曆年間的建構宗族的活動，其實有官府在有意無意地不斷推動着。早在嘉靖三十年（1551），驛丞楊攀和耆老楊瑚便請求山

① 道光《楊氏族譜》，卷1，〈舊譜紀略〉，〈開平楊氏續錄序〉，頁24下-25下。

② 楊榮，《楊文敏公集》（《明人文集叢刊》本，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卷11，〈忠義堂序〉，頁4下-5下。

③ 道光《楊氏族譜》，卷9，〈墳祠圖〉，頁3上。

西布政司右參政趙錦⁶⁴為他們寫了一篇〈贈雁門楊無敵宗嗣門匾敘〉。在敘述了楊令公、楊延平、楊再興等人抗遼或抗金的事蹟後，趙錦寫道：

延歷我明，尚守家廟祖像，延綿七百餘年，能遵王道以立訓，明宗法以類族，耕公田以奉祀，習將略以游藝，各緣份而耕讀，無即陷淫，無從匪彝，猶有虎將之高風。況支脈繁衍，佈滿四方，為武英之世胄如□□□□昌平侯、彰武伯；為文傑墨翰有興濟伯楊善、御史楊滋、綏德州太守楊節之眾。觀此不惟傳之悠久，抑且蔓生廣大，可見祖德宗功，父忠子義，縉紳名物，孚於今古；仁義英賢，相半朝野，殆非土斷白籍之人家也。⁶⁵

趙錦自然知道楊善、楊滋不是代州籍，但他既然認定二者是鹿蹄澗楊氏的本家，也即是承認了鹿蹄澗楊氏此前聯宗通譜的結果。不僅如此，他還贈送了「虎將高風」匾一塊，並為此寫了匾敘。⁶⁶此處需注意非常積極建設宗族的驛丞楊攀，驛丞一職在晉省北方門戶的代州十分重要，驛站平日只需傳遞公文，而在秋防時候，兵馬錢糧交通至為繁忙，因此擔當驛丞的往往是富家大族。

所謂「仁義英賢，相半朝野」，其實大部份是聯宗的結果，在鹿蹄澗楊氏的推動之下，這種宗族建構的活動得到了官府的承認。就在趙錦為楊氏寫了上面的門匾敘之後的第五年，山西提學副使陳樞奉命整飭山西等處學務，從太原出發，經忻州，到代州，他寫道：

學務之暇，閱名山，題勝概，而後觀風採俗，果地傑人靈。由是道經楊延興墳川，曲隱閭約有五百人餘，乃自宋元而共族同塋，似有江州陳公累世敦睦之風，且存宗譜祠堂，實宋中書令代州刺史贈太尉追封開國謚忠武楊公業之宗裔……及入我明，尤沾世澤，支脈繁衍，文武侯伯，雲仍相繼。且能重祠祀、明宗譜、立家約、遵

⁶⁴ 據光緒《山西通志》，卷12，〈職官譜三〉，嘉靖年間任職山西的趙錦是良鄉人。據康熙《良鄉縣志》（《故宮珍本叢刊》本，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卷8，〈藝文志〉，〈守樸趙公墓誌銘〉，趙錦為山西布政司右參政，與族譜所記為山西巡撫不同，茲從縣志。

⁶⁵ 〈贈雁門楊無敵宗嗣門匾敘〉碑，現存鹿蹄澗楊氏祠堂。

⁶⁶ 道光《楊氏族譜》，卷9，〈墳祠圖〉，頁3上。

聖教、置公田、立射圃，有裨治化，宜表揚世教，以勸忠勇。先會同布政司行移文代州官吏，監刻〈表忠閭碑〉並〈奕世將略〉牌匾外，餘復記於碑陰……莫廢勳幹之陵寢，勿混功臣之田土，庶祀典孔昭，酬忠勿替，為此表而記之。⁶⁷

這次對楊氏「忠閭」的表彰，由提學陳樞提出，由布政司和代州兩級官府施行。表彰楊氏的目的，乃在於「表演世教，以勸忠勇」。而且，這個表忠閭碑同時也確認了楊氏的一些經濟利益，「莫廢勳幹之陵寢，勿混功臣之田土」。這一規定對楊氏而言意義非常重大，因為他們自元代以來就擁有大量的土地了。

官府給予楊氏特殊注意並非沒有原因，因為代州毗鄰長城一綫，嘉靖年間蒙古軍隊頻繁入侵，代州修建了大批的堡寨，鹿蹄澗即為代州東部一大堡。嘉靖三十二年（1553）八月初，蒙古軍隊從東邊而來，和官軍在鹿蹄澗附近的棗林大戰，官府「先給告示給鄉民，各截殺逃賊」，鹿蹄澗楊氏亦參與了戰鬥，「據代州東烙鐵縣堡居民楊誦等報驗，本月初一日，達賊攻堡，誦等率眾砍打，斬首級一顆，獲達馬一匹、夷器等件」，因此被獎勵100兩白銀。⁶⁸嘉靖四十四年（1565），敕諭各路築堡修寨造鐘，同時「蒙山西巡撫兵部左侍郎萬大人奏准，敕賜本堡公正堡官一員楊哲，築堡修寨造鐘」。⁶⁹楊哲就是與播州通譜的楊攀的嫡孫，同時被公舉為經理的還有楊彩、楊朗、楊幹臣等。其中楊幹臣就是當年刻〈表忠閭碑記〉的人。嘉靖中後期官府對楊氏的表彰，其實是在地方軍事化的過程中進行的。官府力圖通過樹立典型「以勸忠勇」，而鹿蹄澗楊氏亦可借機增強自己的地方影響力和保護財產。

上文提到，永樂以來鹿蹄澗楊氏跟播州楊氏多次通譜，不過萬曆時，播州楊氏卻發生了一件大事，即楊應龍的叛亂。楊攀挺身入播當在楊應龍叛亂以前，當時播州楊氏跟中央的關係尚好，如嘉靖元年（1522）朝廷還曾賜《四書集注》給播州儒學。楊應龍叛亂從萬曆十七年（1589）到二十八年

⁶⁷ 〈表忠閭碑記〉（嘉靖三十五年〔1556〕），碑存鹿蹄澗楊氏祠堂。

⁶⁸ 趙時春，《浚谷先生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濟南：齊魯書社，1997），卷5，〈督戰報捷疏〉，頁22下。「烙鐵縣堡」是「鹿蹄澗堡」之音訛。

⁶⁹ 新修《楊氏族譜》，卷7，〈鹿蹄澗堡擇要敬錄〉，頁177。

(1600)。三十一年(1603)，播州「餘逆」復叛，但很快就被鎮壓下去了，明「分播地為二，屬蜀者曰遵義府，屬黔者為平越府」。^⑦ 這次平叛結束了楊氏盤踞播州800年的歷史，影響巨大，而作為播州一支的開平楊氏，此後亦不見與鹿蹄澗楊氏有聯繫。楊應龍叛亂的負面影響如此之大，以致後來有人把他們這一支從鹿蹄澗〈弘農宗族圖碑〉上抹掉了。^⑧ 根本不承認他們曾經跟播州楊氏有關係，作為世代忠勇的楊家將的後代是不允許出現叛亂者的。

但是楊家的象徵意義並不因楊應龍的叛亂而有所損傷，叛亂平息僅僅三年，即萬曆三十四年(1606)的時候，雁平兵備道康丕揚在代州大閱兵馬，整頓吏治，修繕城堡，整飭武備。之後又採取了一些文化措施，包括興學校、表貞烈等等，並修繕了代州境內的一些富有象徵意義的文化遺址，如李晉王墓、武安君廟等等，^⑨ 接着他注意到了鹿蹄澗的楊氏：

案牘稍暇，披閱地志，見宋臣楊氏世居代州。訪其後有郡庠諸生者四人，為編氏者三百餘家，皆居代之東北名鹿蹄澗，不知幾歷世矣。又叩其家藏，釐然族譜在焉；尋其塋墓，屹然碑碣存焉。於是取其譜牒，重為修繕，刊刻鉅梓，以彰舊勳。意若曰：楊氏忠義之後，子孫必有興者。睹遺編而興思所為，篤忠貞以紹先烈，必由此矣。顓蒙之俗，豈無豪傑，或有崛起岩穴，聞楊氏遺澤，而有興也，作起忠義必由此矣。今日欽市，我不虜虞，異日戎狄或生異心，聞雁代之有世族，必且懾焉，退卻而潛消不道之謀，亦未可知已。是舉也，所增重於社稷、陶範於民風者，豈小補哉！^⑩

康丕揚很善於發掘楊氏的意義，他希望這個顓蒙之地，即野蠻未開化的

^⑦ 張廷玉等撰，《明史》，卷312，〈列傳〉，〈四川土司二〉，〈播州宣慰司〉，頁8044-8049。

^⑧ 《代縣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中編者的觀察，見頁395-396。筆者也注意到，碑上播州楊氏一支自楊貴遷(文貴)以下都被剝鑿掉了。

^⑨ 李晉王即五代沙陀人李克用，他被認為是忠於唐王朝的典型；武安君廟祭祀戰國時期和匈奴作戰的李牧，代州至少有三個李牧祠，其中之一在雁門關，為萬曆中雁平道和振武衛官員所創建。

^⑩ 新修《楊氏族譜》，〈重訂楊氏世譜舊序〉(萬曆三十五年〔1607〕)，正文頁1-2。

地方，能夠「作起忠義」，震懾蒙古。所以其褒獎楊氏的目的，即在於把楊氏塑造成「增重社稷」、「陶範民風」之典型。他以修譜之事委托山西糧儲兵馬兼管屯糧戶部河南清吏司郎中任彥棻，任「勉承公之至意，乃取楊氏舊譜，稍為檢閱，訛者正之，缺者補之」。^⑭ 這次修譜完全是官府的越俎代庖，以官方而修私家之譜，似乎頗有些匪夷所思，但考慮到楊氏的意義以及楊氏入明以來與官方交往的歷史，也並不難理解。

據忻州楊振宗的〈族譜序〉，任彥棻修譜在萬曆三十五年（1607）。儘管此前族譜已經收錄了〈公田記〉、〈射圃記〉等文，但是這次是《楊氏族譜》在明代的唯一的一次正式修撰。新譜分為四卷，「證諸史傳而總其大略，加〈楊氏世譜序〉及〈楊氏傳略〉」。任彥棻這次所寫的〈楊氏傳略〉，則是很長的考證楊氏歷史的文章，它從楊氏的起源一直講述到他執筆的時代，這樣系統的論述在楊氏歷史上沒有先例，同時它也代表了官府塑造忠義典型的努力。

楊氏家族的命運和光榮一直是在「忠義」的話語下進行的，這無疑決定了他們在政治選擇上的某種傾向，比如族譜凡例中規定：「族眾小童入學，先讀我太祖高皇帝聖訓，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皇訓洋洋，昭如天地，我憲章之，是不可悖」。讀明太祖的〈聖訓六諭〉，以鄉約的內容教育後代，是要在思想上向國家認同。不僅如此，他們還積極地跟高級官僚來往，族譜凡例也明確規定，「（族譜）每三世一續之，求名人為序，違失者以違犯教令治罪」。^⑮ 這一規定體現了楊氏對正統地位的訴求和塑造，而這種訴求和塑造實際上也得到了官府的配合與支持。

六、結語：從「忠閭」的形成看地方文化

鹿蹄澗作為「忠閭」的地位的形成，其實反映了元明300年之間宗族禮儀在代州演變的完整的時間序列。蒙元時期楊友、楊山影堂的建設沒有超出墓祭的範圍，而且當時祭葬還延請大量僧人；而到了元中後期楊懷玉的時代，除延續墓祭之外，開始在鹿蹄澗村興建祠堂，供奉始祖楊業等人的塑像；到了明嘉靖年間，楊氏一方面努力塑造楊氏正宗的形象，同時也進行了

^⑭ 新修《楊氏族譜》，〈重訂楊氏世譜舊序〉，正文頁1-2。

^⑮ 道光《楊氏族譜》，卷1，〈舊譜紀略〉，〈族譜舊例〉，頁18。

一系列的宗族禮儀的建設，這也即是當時官府所看到的：「重祠祀、明宗譜、立家約、遵聖教、置公田、立射圃」等等，並在族規中反對佛道師巫，這些活動反映了楊氏努力按照當時的標準禮儀來建設宗族，後來更進一步獲得官府的承認和表彰。當時的制度背景，一方面是「大禮議」之後宗族禮制的變化，^{⑦⑥}另一方面則是北方邊境的軍事化和國家積極在北邊推行「忠義」的結果。楊氏的「忠閭」稱號，不僅是對楊氏作為忠義傳人的表彰，而且也是對楊氏宗族建設的肯定。

鹿蹄澗祠堂具有一些特徵，比如供奉塑像而非神主牌位，而且祭祀的只是具有功名的先祖，並不是所有的祖先。另外，歷史悠久的祖像「影」，在明代仍然是某些家庭祭祖的主要方式，後來隨着宗族的推廣，至遲在清前期演變為祠堂的圖紙表現形式「容」，並被作為主要的祭祖儀式。^{⑦⑦}這一點與珠江三角洲以祠堂和神主為特徵的宗族禮儀並不一致。由這點我們看到，一個更加悠久和強固的禮儀傳統，是如何影響地方接受新宗族禮儀（朱熹家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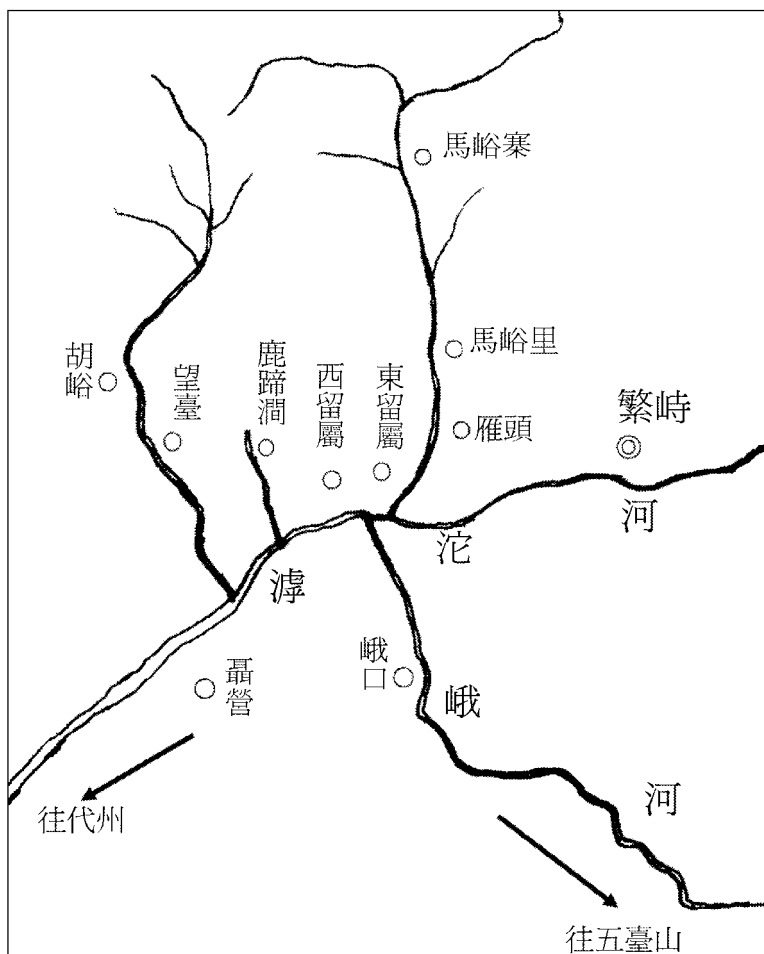
自始至終，無論禮儀怎樣變化，擁有共同的財產一直是楊氏能夠不斷進行宗族建設的基本條件。從蒙元同居共財的大家庭，到元中後期楊懷玉一支居於主導地位，到明代的楊氏八門，儘管人群分分合合，但是對墳地的管理一直都是楊氏宗族活動的內容之一。嘉靖年間官府對他們獎勵的同時，便希望其「勿混功臣之田土」。宗族的建設、官府的旌表，對於楊氏佔有土地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甚至到了清道光年間，在楊氏和五臺山喇嘛爭奪令公塔的護塔地的案件中，楊氏仍是以族譜和朝廷的功臣祭祀作為宣示所有權的依據。^{⑦⑧}文化的正統性其實是與作為控產機構的實際功能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這是楊氏宗族發展的一個基本動力。

^{⑦⑥} 關於大禮議帶來的禮制變化，參見科大衛，〈祠堂與家廟——從宋末到明中葉宗族禮儀的演變〉，《歷史人類學學刊》，第1卷，第2期（2003年10月），頁1-20。

^{⑦⑦} 關於「影」與「容」以及「容」與「祠堂」的關係，參見筆者碩士論文《邊塞與宗族——宋金以降代州的權勢變動與文化認同》（北京：北京師範大學未刊碩士論文，2007），頁70-78。

^{⑦⑧} 道光《楊氏族譜》，卷9，〈墳祠圖〉，〈控五臺番僧侵佔墓塔地基狀〉，頁7下-10下。

附圖：馬峪及鹿蹄澗位置圖



圖片說明：此圖繪製綜合了〈馬峪里地圖〉，見李宏如拓並編，《繁峙碑文集》，頁128；〈代縣〉，見山西省測繪局繪編，《山西省地圖集》（太原：山西省測繪局，1995），頁124。

Loyal Villag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Yang Lineage of Lutijian, Daizhou in Yuan and Ming

Chaojian HAN

Department of Histor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This essay explores how the Yang surname of Lutijian (Deer-hoof Stream), Daizhou, Shanxi, gradually created a lineage organization and ritual practice. The Yang surname first came to local power under the Mongols. For a long period thereafter they maintained a large household with shared residence and common property, as well as extensive cemetery fields and an image hall of ancestral portraits. In the Yuan, as the power of hereditary local warlords declined, the Yang built an ancestral hall in which the statues of the ancestors received offerings. The turmoil of the Yuan-Ming transition affected the internal relations of the lineage. Subsequently the descendants of those members of the lineage who had been entered into state registers in the early Ming gained control over the lineage. In the Jiajing period (1522-1566), the lineage began to implement construction of a “standardized” lineage, with the compilation of a genealogy, creation of a lineage compact, establishment of corporate fields and so on, even if there were many practices, for example the role of the descent-line heir or the arrangement of images in the hall, which were not at all standardized.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forming alliances with other lineages and tracing the origins of the ancestors, they sought

Chaojian HAN, Department of Histor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Hong Kong. E-mail: iamhans1981@hotmail.com.

actively to establish themselves as exemplars of orthodoxy. Their various efforts secured them the praise of state officials, to the extent that state representatives continuously sought to compile a genealogy on their behal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ang lineage in the Yuan-Ming period saw on the one hand a process of dissolution and reintegration of the group, which was also an ongoing redistribution of interests, and on the other a never-ending quest for official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The crucial background to this was the Yang's continuous ownership of large tracts of land.

Keywords: Yuan-Ming period, Daizhou, Lutjian, Yang surname, lineage